冷战后中国何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邓子立　王翠文◎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探讨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原因。作者发现，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并非单一的线性变化，而是经历了参与度“次高→较低→较高”的转变。本文从理性分析视角出发，假设中国对预期收益较大的非洲维和行动，将付出更高的成本参与其中。通过分析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各项收益与成本因素，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笔者的研究结论是，理性逻辑能够有力地解释中国参与的大部分非洲维和行动，即符合预期收益大于支付成本的标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能用理性逻辑进行有力的解释，即存在部分理性缺失的情况。

【关键词】　中国　非洲维和　理性　成本　收益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密切，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对非洲的交往中，随着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凸显，中国外交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据新华社报道，2012 年 1 月 28 日，中国中水电公司在苏丹南科尔多凡

《国际政治科学》2012/2（总第 30 期），第 1—37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州一个工地遭到反政府武装分子袭击，20 多名中国工人下落不明，随后经多方斡旋与营救，被劫持的中国工人安全返回中国（其中 1 人因负伤死亡）。[①] 这件事情折射出一系列关于中国发展的疑问：在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障海外利益的安全？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处理好与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实现国内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本文选择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为议题，这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发生了转变？如果是的话，那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如何解释上述转变？在对本文的问题进行阐述之前，首先需要对上述问题涉及的核心概念作简要的说明。“维持和平行动”（以下简称“维和行动”）是指“经有关各方同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建立，由联合国控制和指挥，依靠联合国会员国集体出资，由会员国自愿提供军事和其他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在冲突各方中公正地行动并且在必要时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旨在试图控制和解决冲突的战地部队”。[②] 所谓“参与”是指中国就维和行动所涉及的相关行为，本文主要从实际派遣、经费分摊、官方发言以及投票记录等方面来考察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

一、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转变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发生了转变？如果是的话，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本文希望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来说明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情况。

根据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比例（见图 1），笔者以

①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9/16972402.html.

② Marrack Goulding, “The Evolution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9, No. 3, 1993, p. 455.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99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99 年以前为参与比例较低阶段，1999 年以后为参与比例较高阶段。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代表的官方发言[①]与人员派遣的特征，笔者将上述两个阶段再细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接触参与、观望参与、恢复参与和扩大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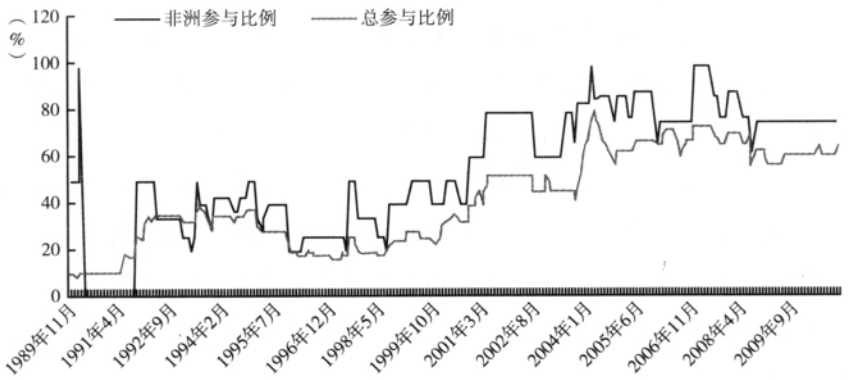

图 1　冷战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比例的变化

注：本文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数据均从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获取，后文不再一一标出。

第一阶段为接触参与阶段（1989—1991 年），中国开始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但参与程度较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代表在官方发言上支持非洲维和行动，但从军事人员的实际派遣情况来看，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比例较低，主要派遣小规模军事观察员，在维和经费方面中国所占比例较小。在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主要是官方言论的支持以及象征性的军事人员派遣。不可否认，无论是维和政策的积极转变还是实际派遣的象征性突破，对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中国始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作用基本持肯定的立场。

① 官方发言是指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以及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例会上的发言，具体文本可参考联合国文件系统、《中国外交概览》、《中国外交》、《人民日报》等。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阶段为观望参与阶段（1991—1999年），中国开始谨慎观察非洲维和行动，在适应与学习中保持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基本保持较低的参与比例，派遣小规模维和观察员，在维和经费方面中国所占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在官方发言上更多地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则与宗旨。在这一阶段，中国不再一味地强调维和行动的和平贡献，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维和困境的时候，中国开始反思维和行动的问题所在，在适应与学习中阐明自身的维和政策。在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进入快速扩张以及随后的低迷不振阶段后，中国持谨慎的观望立场，采取减少参与、小规模派遣维和观察员的做法，更多的是在官方发言上强调非洲维和行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与宗旨。尽管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但由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参与十分有限，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严重，因此中国没有完全退出，而是持一种观望态度。

第三阶段为恢复参与阶段（1999—2003年），中国转向相对积极的维和政策，逐步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比例开始增加，以《国防白皮书》的发布为标志，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政策与发言趋向积极，维和经费方面中国承担比例稍有上升，但中国仍然保持较小规模的人员派遣。在这一阶段，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在政策立场上有了明显的积极转变，中国政府高度肯定维和行动对非洲稳定的积极作用，并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维和经费分摊比例也有所上升。中国开始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放到非洲维和行动的事业之中，但由于人员培训等方面需要时间，因此逐步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有一个过渡阶段。

第四阶段为扩大参与阶段（2003—2010年），中国继续推行相对积极的维和政策，进一步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为：中国继续保持对非洲维和行动的较高参与比例，并派出较大规模的维和人员，特别是增加大量的军事部队参与，在维和经费方面中国开始逐步承担更大的比例，在官方发言方面中国更多地从维和行动改革与提高效率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面提出建议。在这一阶段，中国主动派遣大规模维和使团参与新部署的非洲维和行动，并注重人员选拔、安全保护、舆论宣传等后勤保障工作，“维和”开始成为中国政府乃至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此，中国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非洲维和政策，同时国内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维和人员培训与选拔体系，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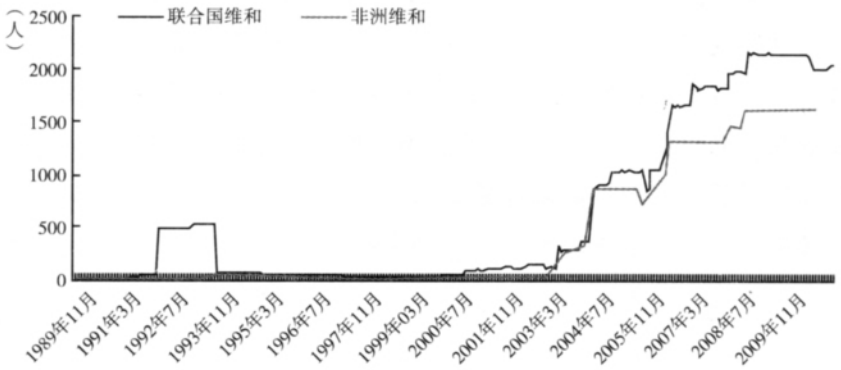

图 2　冷战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与非洲维和行动参与规模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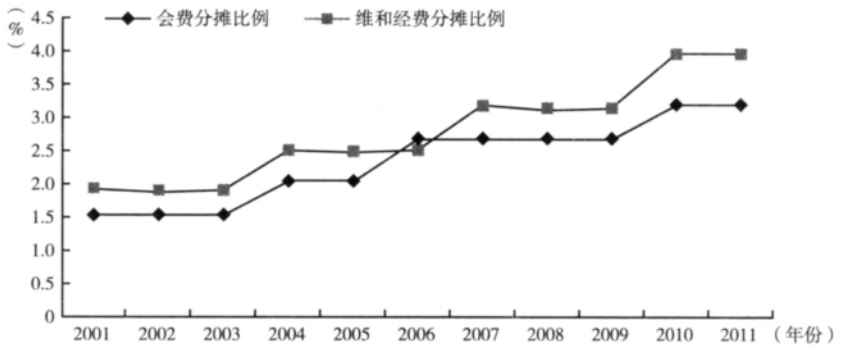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向联合国缴纳费用分摊比例的情况（2001—2011 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年度预算文件 ST/ADM/SER. B/568，ST/ADM/SER. B/582，ST/ADM/SER. B/597，ST/ADM/SER. B/612，ST/ADM/SER. B/638，ST/ADM/SER. B/668，ST/ADM/SER. B/701，ST/ADM/SER. B/755，ST/ADM/SER. B/789，ST/ADM/SER. B/824，A/C. 5/55/38，A/C. 5/56/36，A/C. 5/56/36，A/C. 5/57/22，A/C. 5/58/35，A/C. 5/59/34，A/C. 5/60/27，A/C. 5/61/18，A/C. 5/62/23，A/C. 5/63/23，A/C. 5/64/19，A/C. 5/65/15，A/C. 5/65/19，A/58/157，A/61/139，A/64/220。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参与度”来衡量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参与度”是意愿和行动的有机组合，意愿维度包括投票表决和官方发言两部分，而行动维度则包括实际派遣和经费分摊两部分。意愿维度、行动维度与参与度都是正相关关系：意愿水平越高，参与度也越高；行动水平越高，参与度也越高。根据前面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阶段特征，用意愿维度和行动维度界定的“参与度”来分析，可以看出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转变。各个阶段中国参与度情况如下：在接触参与阶段，意愿维度较高，但行动维度较低；在观望参与阶段，意愿维度和行动维度都较低；在恢复参与阶段，意愿维度较高，但行动维度较低；在扩大参与阶段，意愿维度和行动维度都较高（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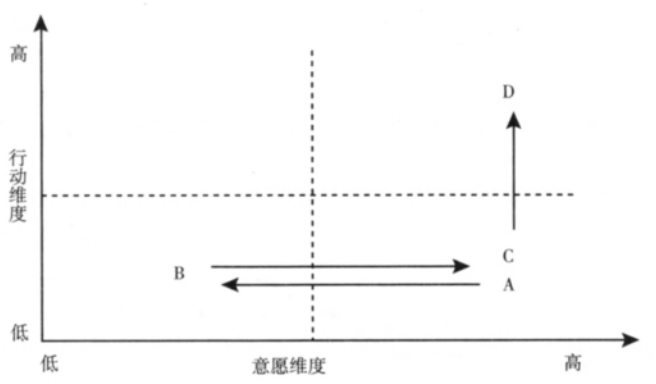

图4　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参与度的转变

注：A（接触参与阶段）、B（观望参与阶段）、C（恢复参与阶段）、D（扩大参与阶段）

由图4可以看出，以参与度进行衡量，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并非单一的线性变化，总体而言，中国经历了参与度“次高→较低→较高”的变化。具体而言，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经历了“高意愿+低行动→低意愿+低行动→高意愿+低行动→高意愿+高行动”的转变。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既有解释

有关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既有文献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冷战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转变？

（一）冷战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转变

对于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规模有所扩大的趋势，部分学者抱乐观态度，认为中国事实上以开放、自由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笔者把这些学者称为“积极派”；也有部分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在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在中国参与维和行动问题上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笔者把这些学者称为“保守派”。

两派学者对于冷战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历史的不同判断也影响到对未来趋势的不同预期。积极派学者强调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现实，强调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联系利益，倡导中国从现实出发，对主权过于敏感只会阻碍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适当的方式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①] 与之相反，保守派学者认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防御性的，表现为对主权原则的坚持，也表现在中国在安理会表决时往往采用弃权的投票方式。弃权被认为仅是权宜之计，是被动的反应，一方面，改变以往不参加投票的做法，表明中国愿意参与国际政府间组织；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维和制度的承诺是软弱的，甚至更多时候表现出反对的态度，却又不愿意持否决态度而阻止决议执行。[②] 福拉瓦

① 代表性观点参见唐永胜 《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 年第 9 期，第 39—44 页。

②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 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n Survey*, Nov. 1996, pp. 1102 – 1121; 金淳基 《中国与联合国》，载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博格主编 《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闫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87 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尔（M. Taylor Fravel）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困境称之为“既不能接受它，又不能离开它”。①

（二）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转变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大致上从国际和国内层面探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遵循自外而内逻辑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责任攸关论”、“工具理性论”、“国际合法性”；遵循自内而外逻辑的观点仍不成熟，并没有形成相关理论，笔者称之为“国内视角”。

持“责任攸关论”的学者认为，作为“责任攸关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在于把维和行动看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国际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保护等）的一种可行方式。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官员都认同这一观点。② 刘铁娃和张萍就指出，中国维和政策以中国发展战略为基础，并力所能及地为国际和平贡献力量，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也是“自信、负责任的大国”，这是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动机。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表明，中国对外政策更多地考虑绝对收益而不是相对收益，中国正在成为“责任攸关方”。③ 张敬民认为，维和政策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体现，这反过来表明中国已经担当起维护和保护现有国际体系的责任。“作为负责任的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有能力并且有可能维护地区以及全球范围的和平与安全。”④

持“工具理性论”的学者认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根本动机在于

---

①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 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p. 1121.

② 代表性观点参见 Tang Yongshe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Regime,” in Wang Yizhou ed., *Construction within Contradi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 73 – 99; 赵磊：《“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外交评论》2006 年第 1 期，第 30—36 页。

③ Liu Tiewa, “Marching for a More Open, Confident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Explaining China's Involvement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3, No. 1 – 2, 2009, pp. 101 – 130; Zhang Ping, “Remarks on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arch, 2007, http: //www. regjeringen. no/.

④ Liu, “Marching for a More Open, Confident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p. 124.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工具理性层面的原因，如确保自然资源获取、平衡大国力量等。实际上，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多数聚焦在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维和行动，因为非洲涉及中国诸多的物质与战略利益。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全面接触与渗透，中国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贡献也不断扩大，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直接联系，即非洲自然资源或潜在市场可能导致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① 这些学者大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他们认为物质收益或战略收益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首要原因。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使得一国保有或获得在国际体系中现有或预期的地位，并获取诸多私人产品。② 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动机，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包括平衡美国实力、提升中国实力建设、塑造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确保关键私人产品（如能源、市场等）的获得。需要指出的是，在支持“工具理性论”的学者当中，有一些学者也承认非物质因素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作用，不过他们认为非物质因素仅仅处于次要地位。③

持“国际合法性”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基于对“声望”和“国际合法性”的考虑。作为理性行为体，中国之所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因为中国相信从中能够直接获益（区别于“责任攸关论”的解释），虽然这种获益从本质上而言主要是观念上的（区别于“工具理性论”的解释）。这些学者强调中国渴望被视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或“合法”的行为体，然而，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

① See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p. 327.

② 关于维和行动是否“纯公共产品”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维和行动并非“纯公共产品”，因此维和行动会提供额外获益，如维和参与国在驻在国享有巨大的经济或政治影响力。参见 Davis B. Bobrow and Mark A. Boyer, “Maintaining System Stability: Contributions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41, December 1997, pp. 725 – 727。

③ See Erik Lin-Greenberg, “Blue Helmeted Dragons: Explaini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M. A., di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9, p. 11; Philippe D. Rogers, “China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fric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0, No. 2, 2007, p. 77; Dennis J.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76.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行动主要为了维护人权或国际和平。相关研究认为，“在中国看来，参与维和行动被认为是履行对联合国或国际和平与安全承诺的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同时也是缓解由于中国实力上升所带来的担忧的一种方式”。① 季北慈（Bates Gill）和黄劲豪（Chin-Hao Huang）指出，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的主要出发点，特别是中国日益介入一些“高度敏感和潜在危险的行动”，如达尔富尔行动（UNAMID），这表明中国致力于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回应国际舆论针对中国与非洲问题国家发展关系的批评。② 何银指出，中国的维和战略旨在“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声誉与意愿，也是希望强化联合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③ 中国“维和外交”是向世界展示和塑造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工程中的组成部分。④

从国内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比较集中地讨论：主权原则或不干涉原则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国家主权看法出现的灵活性是中国更加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原因。⑤ 中国在维和立场上的灵活性使

---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No. 166, April, 2009, http://www.crisisgroup.org/.

②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Paper*, No. 25, 2009, http://books.sipri.org/product_info?c_product_id=393.

③ 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July 2007,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Silkroadpapers/2007/YinHe0409073.pdf; 聂军 《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19—22 页。

④ Bonny Ling, “China's Peacekeeping Diplomacy,” *China Rights Forum*, No. 1, 2007, http://www.hrichina.org/.

⑤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p. 104 – 136; Bates Gill and James Reilly,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The View from Beijing,” *Survival*, Vol. 42, No. 3, Autumn 2000, pp. 41 – 59; Allen Carlson, “Helping to Keep the Peace (Albeit Reluctantly): China's Recent Stance on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 Interven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77, No. 1, 2004, pp. 9 – 27; Pang Zhongying, “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2, No. 1, Spring 2005, pp. 87 – 104; Stefan Stähle,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5, 2008, pp. 631 – 655.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得中国能够更加积极、频繁地参与维和行动，甚至在一些高度敏感的国家和地区，如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中国对“卜拉希米”报告（Brahimi Report）作出了积极回应，对非传统意义的维和行动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希望从之前的维和经验中吸取教训，寻求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有效方式。① 然而，中国对维和行动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是有限的，尤其是中国对维和部队使用武力始终比较敏感，认为维和行动必须坚持两条原则：当事国的同意和安理会的授权。正是由于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立场的灵活性是十分有限的，也决定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只能是有限参与。② 从国内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维和行动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国海外能源和利益的获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压力，这些都需要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考虑到自身的统一问题和民族问题，中国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坚持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属于“刺激—反应”式的被动外交，中国需要逐步调整既往政策，实现外交转型。③

在笔者看来，上述分析主要是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的积极转变，如维和人员派遣规模增加等；对于中国行为转变的原因，尽管有学者从“塑造国际形象”、“负责任大国”等角度进行解释，但仍缺乏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

从分析视角而言，既有研究缺乏将物质与观念结合起来，并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中分析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原因。“责任攸关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其更多的是从应然的角度进行价值取向的判断，并没有从国家现实利益角度回答

① Ståhle, “China's Shifting Attitude towa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p. 638 – 650.

② Pang, “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p. 98.

③ 王猛：《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35—4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能否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这些责任”的问题。因此，“责任攸关论”主要从应然角度分析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缺乏对实现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工具理性论”似乎站到“责任攸关论”的另一端，主要从理性角度分析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战略计算，并假定中国追求物质利益为主。然而，这种解释具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即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到中国攫取海外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缺乏论证（这正是本文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而且偏重静态分析的“工具理性论”也不能解释冷战后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所出现的行为转变。“国际合法性”更多地强调中国对观念收益的理性考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具理性论”的不足。从国内视角出发的学者一般从两方面进行展开：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以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希望以有限的维和部队派遣实现最大的国家收益；另一方面，中国自身面临着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因此中国十分关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范与价值取向，希望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在尊重国家主权与安理会授权的原则下进行。以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视角作为切入点，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新的解释。

笔者认为，遵循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有利于既有解释的相互对话与补充。“责任攸关论”从道义利他立场出发，将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看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则强调国家行为首先是利己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遵循成本—收益的计算，追求以最小成本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理性主义者提出“工具理性论”和“国际合法性”的解释，认为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观念层面，国家行为仍然是遵循成本—收益的理性思维。然而，无论是“工具理性论”还是“国际合法性”，两种解释还没有很好地将物质与观念结合起来，还没有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遵循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厘清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与成本因素，试图分析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行为逻辑。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理性主义的分析视角

理性主义指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形式化或非形式化的运用，即那些借鉴微观经济学理论传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或者更宽泛地指那些通过目标寻求型行为来解释外交政策的实证主义研究”。[①]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它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战略算计者（经济人假设），行为体能够根据成本—收益的权衡追求最佳的策略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由此，理性选择理论从行为个体的利益出发解释特定环境下个体的或集体的行为与结果。这里所谓的利益即个体的偏好，而个体的偏好通常被研究者视为既定的，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关心偏好的形成，而把既定的偏好作为研究的起点。[②]

理性视角假设，国家行为及行为转变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本文探寻理性对国家行为的作用时遵循以下分析思路。[③]

1. 国家并不将某种国际社会的规范或规则视为理所当然。国家将国际规则或规范视为外部制度事实，国际制度支持或鼓励遵守规范的行为，而对规范破坏的行为增加成本。

2. 国际制度的强化机制发生作用。具体而言，国际制度奖励遵守规范的行为，惩罚破坏规范的行为，目标国家为了避免惩罚或获取奖励，而遵守规范与规则。上述奖励或惩罚对目标国家的安全与福利产生影响，改

---

①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s.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54.

② 对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利益”或“偏好”，我们可能存在两个误解：一是把“偏好”看做理性的；二是认为行为个体是利己主义者，其所追求的目标是自私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不存在“偏好”是否理性的问题，所谓的“理性”指的是行为个体能够进行“理性”的计算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行为个体的利益并不局限于利己的物质利益，它也包含利他的、规范的或理念的目标。

③ 参考 Frank Schimmelfennig,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Membership Incentives, Party Constellations, and Sustained Compli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827 – 860。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变政治行为体获取或维持权力的机会成本。

3. 在衡量强化机制下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国家根据自身目标进行政策选择。国家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最初由自身界定的政治偏好驱动，并假定这种政治偏好主要是物质或权力导向的，包含安全、福利以及寻求获取或维持政治权力等内容，观念导向的偏好也适当考虑。

4. 关于强化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如果遵守规范能够增加政治效用，而且适应规范期望的外部承诺奖励大于适应规范的成本，那么国家将选择遵守国际规范；反之亦然。因此，强化机制起作用的条件是：目标国期望外部承诺的奖励高于适应的成本时，该国会选择遵守规范；目标国期望外部承诺的奖励低于适应的成本时，该国会选择破坏规范或操纵规范。为了避免或减少遵守国际规范的成本，国家往往选择在战略上对规范进行操作。他们借助现有国际规范为利己主张辩解，通过修辞使其偏好和行动与规范相符合。

从理性视角出发，本文假设中国对预期收益较大的非洲维和行动，将付出更多成本参与其中。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从理性视角来看，冷战后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是规范适应行为，理性选择在其中发挥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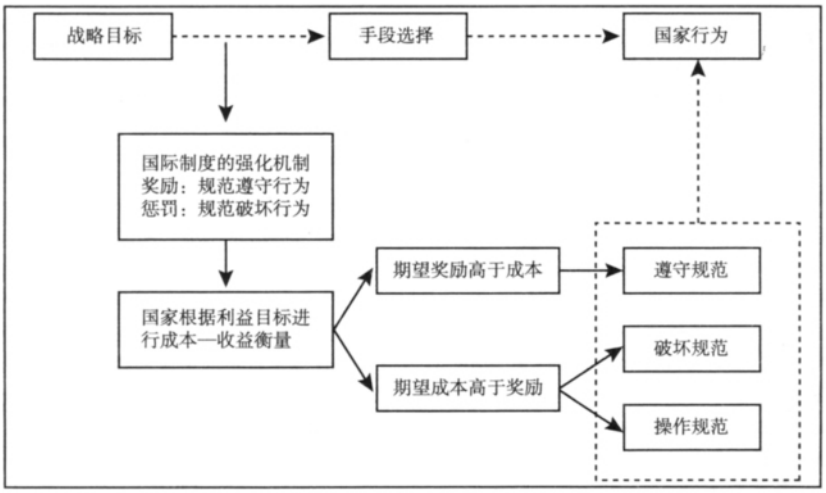

图5　理性选择对国家行为的作用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要作用。在奖励与惩罚的强化机制下，国家根据自身偏好与目标进行成本—收益的衡量。事实上，中国对国际维和规范的适应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表现为通过规范操作减少成本。

根据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成本与收益因素，本文对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理性逻辑的分析，试图回答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一方面，根据冷战后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笔者归纳出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各项收益与成本因素，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因素，并且根据其重要性赋予相应的权重。另一方面，在仔细考察冷战后中国参与的各项非洲维和行动的基础上，笔者对每一项行动进行赋值与统计，得出各项收益与成本因素的数据。

四、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与成本

（一）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

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中国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方式与手段之一。从理性视角分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有着自身的战略考量，即以合理的成本付出换取重要收益。那么，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因素有哪些？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全面考察基础上，根据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本文将作为收益因素的预期目标划分为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领域，又具体细分为六类：（1）政治支持；（2）捍卫主权；（3）地区影响；（4）商业利益；（5）能源资源；（6）军事实践经验。[①] 下面将对这些收益因素进行分析。

1. 政治目标

首先是政治领域的目标，包括政治支持与捍卫主权两方面。增强中国

① 关于冷战后中国对非洲战略，参考 Joshua Eisenman，“China's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Africa: Examining Beijing's Methods and Objectives，” in Joshua Eisenman，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eds.，*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M. E. Sharp，2007），pp. 29 – 52.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基本目标。[①] 因此，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重要政治考量是获取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支持。最直接的反映是在国际事务上加强中非的团结与合作，促使中国与非洲国家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协调立场与达成共识，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人权等重大问题上寻求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另外，非洲仍然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所谓的“美元外交”博弈的重要战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都尽可能地争取与尽可能多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赞赏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和官方往来，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中国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未建交国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②] 由此可见，争取非洲国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始终是中国对非战略的重要方面。

“政治支持”考察非洲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与西方国家不一致的表态）是否持支持的态度，具体可考察非洲国家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记录的相似程度，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记录可以查询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书目信息检索系统（http://unbisnet.un.org/indexc.htm）。“政治支持”通过以下具体方式进行操作：在冷战后中国投弃权票与否决票的决议案中，如果非洲维和行动当事国的表决态度与中国相反，[③] 表明中国没有取得该国的政治支持；如果非洲维和行动当事国的表决态度与中国相符，[④] 则表明中国取得该国的政治支持。根据联合国投

① Joshua Eisenman，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eds.，*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M. E. Sharp，2007），p. 34.

②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06 年 1 月，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1/12/content_4042317.htm。

③ 中国与非洲国家表决态度相反包含以下情况（中国—非洲国家）：弃权—赞成，反对—赞成。

④ 中国与非洲国家表决态度相符包含以下情况（中国—非洲国家）：弃权—反对，弃权—弃权，反对—反对，反对—弃权。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票记录，笔者整理了冷战后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安理会部分表决情况，集中反映在中国持反对态度的安理会决议案中非洲国家是否持一致态度（见表1）。

表1　中国与非洲国家安理会表决的情况

安理会决议案	中国表决	非洲国家表决	是否一致
S/RES/748(1992)	弃权	摩洛哥——弃权；津巴布韦——弃权；佛得角——弃权	相符
S/RES/883(1993)	弃权	吉布提——弃权；摩洛哥——弃权；佛得角——赞成	吉布提、摩洛哥——相符；佛得角——不相符
S/RES/929(1994)	弃权	吉布提——赞成；尼日利亚——弃权；卢旺达*——赞成	吉布提、卢旺达——不相符；尼日利亚——相符
S/RES/955(1994)	弃权	吉布提——赞成；尼日利亚——赞成；卢旺达*——弃权	吉布提、尼日利亚——不相符；卢旺达——相符
S/RES/1054(1996)	弃权	博茨瓦纳——赞成；埃及——赞成；几内亚比绍——赞成	不相符
S/RES/1070(1996)	弃权	博茨瓦纳——赞成；埃及——赞成；几内亚比绍——赞成	不相符
S/RES/1556(2004)	弃权	阿尔及利亚——赞成；贝宁——赞成；安哥拉*——赞成	不相符
S/RES/1564(2004)	弃权	阿尔及利亚——弃权；贝宁——赞成；安哥拉*——赞成	阿尔及利亚——相符；贝宁、安哥拉——不相符
S/RES/1591(2005)	弃权	阿尔及利亚——弃权；贝宁——赞成；坦桑尼亚——赞成	阿尔及利亚——相符；贝宁、坦桑尼亚——不相符
S/RES/1593(2005)	弃权	阿尔及利亚——弃权；贝宁——赞成；坦桑尼亚——赞成	阿尔及利亚——相符；贝宁、坦桑尼亚——不相符
S/RES/1672(2006)	弃权	刚果*——赞成；加纳——赞成；坦桑尼亚——赞成	不相符
S/RES/1706(2006)	弃权	刚果*——赞成；加纳——赞成；坦桑尼亚——赞成	不相符
S/RES/1907(2009)	弃权	布基纳法索——赞成；利比亚——反对；乌干达*——赞成	利比亚——相符；布基纳法索、乌干达——不相符
S/RES/1945(2010)	弃权	加蓬——赞成；尼日利亚——赞成；乌干达*——赞成	不相符
S/1997/18	反对	埃及——赞成；几内亚比绍——赞成；肯尼亚——赞成	不相符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续表

安理会决议案	中国表决	非洲国家表决	是否一致
S/1999/201	反对	纳米比亚* ——赞成；加蓬——赞成；冈比亚——赞成	不相符
S/2007/14	反对	刚果* ——弃权；南非——反对；加纳——赞成	刚果、南非——相符；加纳——不相符
S/2008/447	反对	南非——反对；利比亚——反对；布基纳法索——赞成	南非、利比亚——相符；布基纳法索——不相符

注：带* 者为非洲维和行动当事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记录整理。

表2　非洲地区组织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

维和行动名称	相关地区组织	活动描述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MINURSO）	非洲统一组织	在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进行斡旋，配合联合国行动
联合国第一次索马里行动（UNOSOMI）	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	推进政治进程，达成和平协定
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ONUMOZ）	非洲统一组织	参与管理与督察委员会，促进和平协议的执行
联合国乌干达—卢旺达观察团（UNOMUR）、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	非洲统一组织	调停胡图族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之间的冲突，组织中立军事观察小组，促进政治谈判
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UNOMIL）、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	西非经济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	组成军事观察小组，促进政治谈判与和平协定；敦促执行《科托努和平协定》
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UNOMSIL）、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	西非经济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	组成军事观察小组，促进政治谈判与和平协定
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C）	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促成了卢萨卡停火协议的签署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特派团（UNMEE）	非洲统一组织	协助签署《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联合国科特迪瓦特派团（MINUCI）、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OCI）	西非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	组成多国联络小组进行调停，推动反政府武装和科特迪瓦政府进行对话，讨论解决危机的总框架
联合国布隆迪行动（ONUB）	非洲联盟	推进和平协定，派驻特派团部队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UNMIS）	东非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	协助签署《马查科斯议定书》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	非洲联盟	协助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部署维持和平特派团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资料整理。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捍卫主权”考察中国是否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或者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致力于维护主权平等原则。具体可考察非洲维和行动相关的安理会决议是否写有“取得当事国同意”的语句，以及维和行动当事国是否与中国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往来等进行分析检验。①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内容可以从联合国文件中心（http://www.un.org/zh/documents/ods/）查询，至于非洲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是否存在外交关系则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查询。

“地区影响”考察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与非洲地区组织的意愿相一致，或者非洲地区组织对中国的参与是否持肯定的态度。具体可考察中国参与的非洲维和行动是否涉及与非洲地区组织进行协调与合作进行检验，具体的材料依据来源于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关于各项非洲维和行动的背景与进程。

2. 经济目标

其次是经济领域的目标，包括能源资源和商业利益两方面。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重要经济考量是，确保中非经贸往来最低限度地受非洲动荡的安全形势所影响，通过扩大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促使非洲安全形势的好转。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能源需求的扩大，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被提到了对非洲战略的重要地位。虽然中国从非洲国家购买的能源资源仅构成中国进口量微不足道的比例，但中非经贸量对很多非洲国家而言，却占据着这些国家石油生产出口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非洲能源构成了中国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凭借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话语权。此外，中国对非洲

① 2000 年陈水扁上台后，接连丢掉利比里亚、塞内加尔、乍得、马拉维等国家的支持，动摇了台湾在非洲地区的“邦交”根基。截至 2010 年底，与中国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仅剩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斯威士兰 4 个国家。参考曾润梅 《台湾与其“邦交国”关系简述》，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台湾研究所网页 http://www.cassits.cn/zjlt/news_0001.html。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还有能源资源以外的需求，如从非洲进口矿产资源、钢铁、棉花等。[①] 从数据上看，2000 年至 2008 年，中非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 33.5%；2009 年，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非贸易额下降到 910.7 亿美元，但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中非贸易呈现良好的恢复发展态势。[②] 随着中非在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肩负着稳定非洲地区安全局势的使命，为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能源资源”主要考察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旨在加强与能源丰富国家的关系，或者考察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旨在确保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具体可考察非洲维和行动当事国的能源禀赋以及中非在能源资源领域的合作状况，相关数据源自英国石油集团公司[③]（British Petroleum）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④]（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UN COMTRADE）的统计。

值得指出的是，中非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中非双边贸易额在 2000 年超百亿美元后，2008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33.5%，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2.2% 上升至 4.2%。[⑤] 非洲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额占非洲石油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0.77% 增加到 2009 年的 10.07%，9 年间增长了 9.30 个百分点，在非洲石油出口的目标国之中，中国的增幅遥居首位。[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非洲作为中国重要石油进口地区的地位正在提高，作用正在增强，中国对非洲石油的依赖程度也正在与日俱增。从表 5 可以看出，1992 年，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额仅为 0.77 亿美元，

① “China's Trade with Africa Rising Fast,” *People's Daily*, November 26, 2004,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11/26/eng20041126_165265.html.

②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 年 12 月，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23/c_12911586.htm。

③ 可参见英国石油集团公司网站 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④ 可参见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网站 http://comtrade.un.org/。

⑤ 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 年 12 月发布。

⑥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　非洲部分国家的石油探明储量

单位：10 亿桶

国家＼年份	1990 年底	2000 年底	2010 年底
利比亚	22.8	36.0	46.4
尼日利亚	17.1	29.0	37.2
阿尔及利亚	9.2	11.3	12.2
埃及	3.5	3.6	4.5
突尼斯	1.7	0.4	0.4
安哥拉	1.6	6.0	13.5
加蓬	0.9	2.4	3.7
刚果	0.8	1.7	1.9
苏丹	0.3	0.6	6.7
乍得	—	0.9	1.5
赤道几内亚	—	0.8	1.7
非洲总计	58.7	93.4	132.1

资料来源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

表 4　非洲部分国家的石油日产量

单位：千桶

国家＼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尼日利亚	2155	2274	2103	2238	2431	2499	2420	2305	2113	2061	2402
阿尔及利亚	1578	1562	1680	1852	1946	2015	2003	2016	1993	1818	1809
利比亚	1475	1427	1375	1485	1623	1745	1815	1820	1820	1652	1659
埃及	781	758	751	749	721	696	697	710	722	742	736
安哥拉	746	742	905	870	1103	1405	1421	1684	1875	1784	1851
加蓬	327	301	295	240	235	234	235	230	235	230	245
刚果	254	234	238	217	223	245	278	228	241	270	292
苏丹	174	217	241	265	301	305	331	468	480	479	486
赤道几内亚	91	177	230	266	351	358	342	350	347	307	274
突尼斯	78	71	74	68	71	73	70	97	89	83	80
乍得	—	—	—	24	168	173	153	144	127	118	122
非洲总计	7804	7897	8028	8411	9336	9902	9918	10218	10204	9698	10098

资料来源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额的4.47%。此后，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额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到2008年，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额增加到了历史最高的389.44亿美元，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额的30.11%（见表5）。

表5　中国从非洲及世界进口石油情况（1992—2009）

单位：亿美元，%

年份	非洲	世界	占比
1992	0.77	17.24	4.47
1993	3.19	23.23	13.73
1994	0.66	15.73	4.20
1995	2.58	23.56	10.95
1996	2.80	34.07	8.22
1997	9.12	54.56	16.72
1998	2.87	32.75	8.76
1999	8.76	46.41	18.88
2000	36.15	148.61	24.33
2001	25.97	116.61	22.27
2002	28.94	127.57	22.69
2003	48.48	197.82	24.51
2004	100.62	339.12	29.67
2005	145.68	477.23	30.53
2006	210.21	664.12	31.65
2007	258.54	798.58	32.37
2008	389.44	1293.31	30.11
2009	271.25	892.56	30.39

资料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其次，“商业利益”考察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与中非之间的经贸关系直接相关，或者考察非洲维和行动当事国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存在紧密的经贸关系。具体可考察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以及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采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国商务部①、世界银行②提供的数据。

① 可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② 可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中国出口的情况来看，中国对非出口主要集中在南非、埃及、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家，集中趋势明显（见图6）。中国对非洲出口前十大国家合计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71.08%增加到2009年的71.76%，9年间增加了0.68个百分点，总体来说比较稳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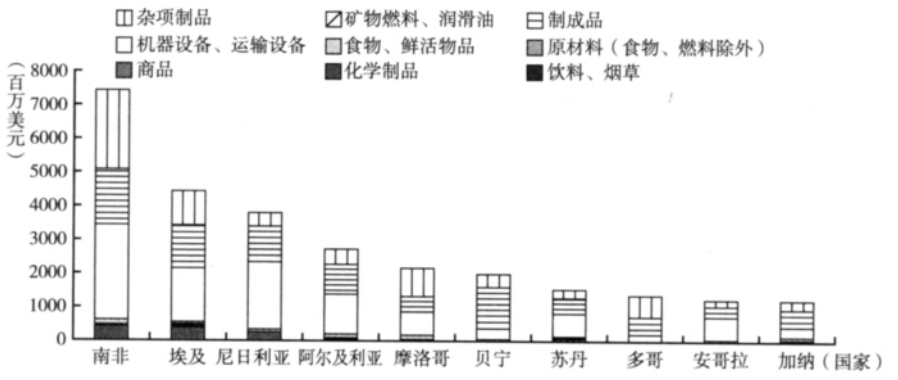

图6　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情况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2008年报告。

从中国进口的情况来看，中国从非洲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安哥拉、南非、苏丹、刚果等国家（见图7）。中国从非洲进口前十大国家合计占中国从非洲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84.32%增加到2009年的88.33%，9年间增加了4.01个百分点，仍呈现上升趋势。②

从中国投资与援助情况来看，中国对非洲资金流向主要集中在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刚果、苏丹等国（见图8、图9）。

3. 军事目标

最后是军事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军事实践经验。参加非洲维和行动给

①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数据库。
②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数据库。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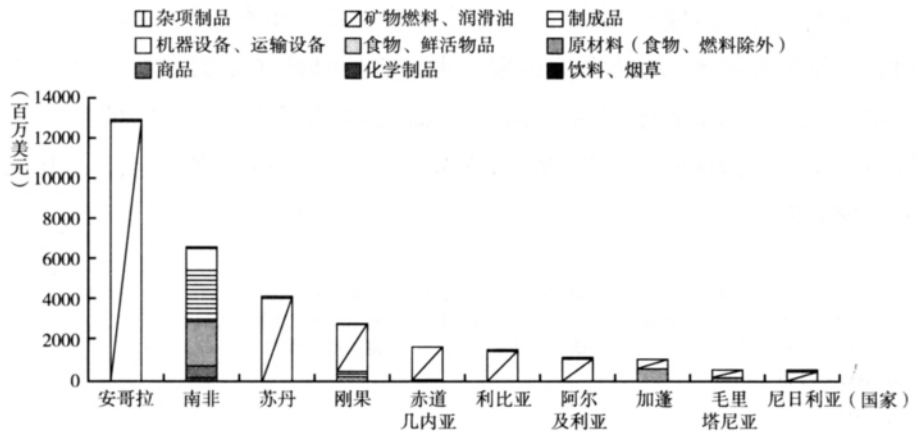

图 7　非洲国家对中国出口的情况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2008 年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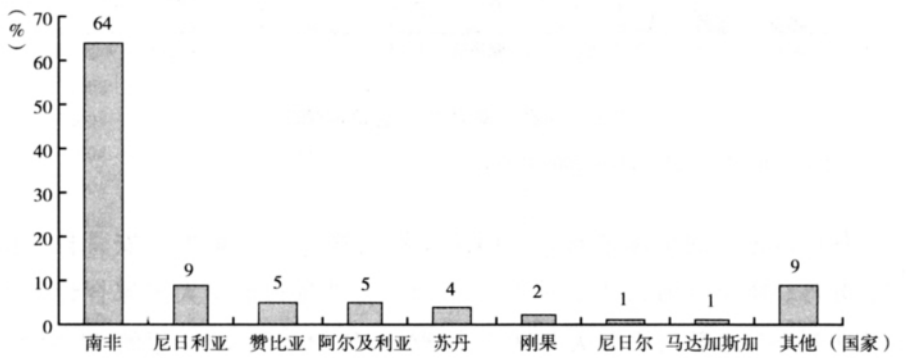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向（2008）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统计年鉴（2008）。

中国军事力量带来重要的战略与战术收益。[①] 冷战结束以来的 20 多年里，虽然大部分中国军队没有实战经验，但通过中国军队在非洲维和行动的大量部署，这促使中国军队获取在不同地域环境作战的宝贵知识。中国在维和人员的训练与部署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联合国系统也有了更

① Gill and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 15.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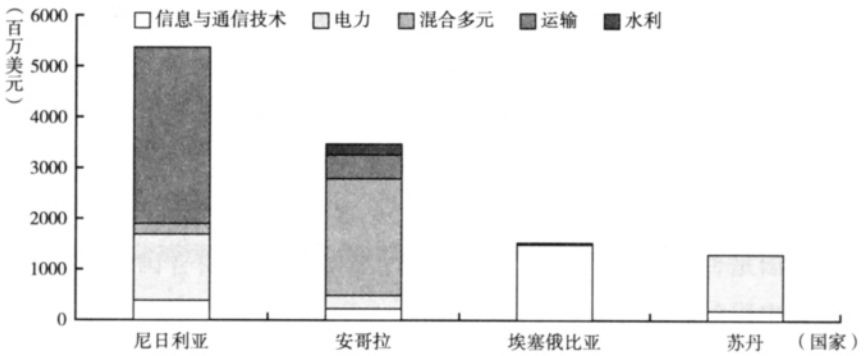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基础设施计划的财政援助受益国（2001—200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09 **年统计数据。**

多的了解。[①] 派遣部队回到中国后，在军队中分享维和行动的宝贵经验，这有助于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政府的公安部门与国防部门通过建立自己的训练体系，提升中国派遣人员的技战术水平以及综合能力，以满足联合国的要求。此外，中国在后勤供给、部队计划以及成建制管理等方面也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②]

“军事实践经验”考察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否旨在获取实战演练的军事实践经验，具体可考察中国维和人员实际派遣规模、派遣期限以及人员构成等相关数据，联合国维和网站能够提供相关的事实数据。

（二）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成本

为了实现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领域的目标，中国采取了诸多不同的手段，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这些手段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中国采取“软方式”（soft approach），在人道援助、文化与教育计划方面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与影响力，通过医药合作、旅游、留学生计划等形式传递善

①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47.

② Ibid., p. 48.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意，加强双方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各国政府进行直接援助，如农业与技术援助、投资与经济援助、军事支持与维和行动等，这些直接援助也是中国对非外交中的重要部分。在这些诸多手段中，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维和行动并非中国与非洲双边的军事援助行为，而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军事计划。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参与多边的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推进中国对非洲的战略目标。

作为成本因素的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实施手段从以下五方面考察：（1）投票表决：弃权与赞成；（2）经费分摊：2003 年以前承担比例偏小与 2003 年以后承担比例逐步增加；（3）派遣规模：不派遣、50 人以下的小规模派遣与 50 人以上的大规模派遣；（4）派遣期限：长期派遣（2 年以上）与短期派遣（2 年以内）；（5）伤亡情况：有人员牺牲与无人员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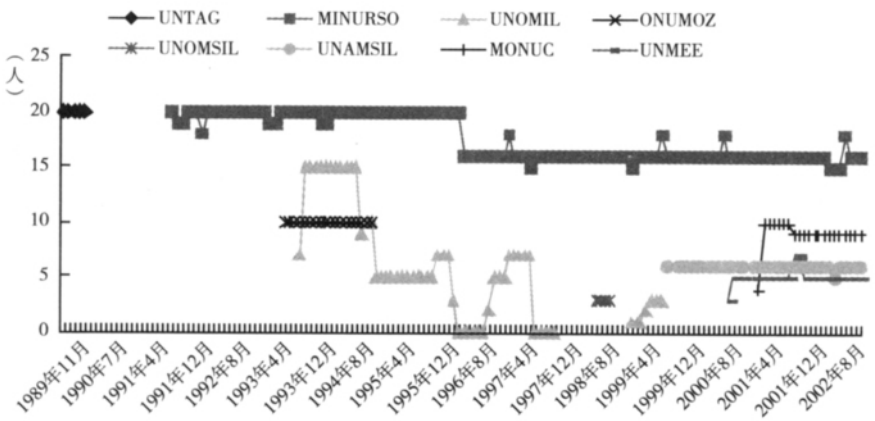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向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派遣人数（1989—2002）

成本因素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操作。（1）投票表决之“弃权”与“赞成”通过安理会决议案投票记录得出，分为“弃权”与“赞成”（中国在非洲维和相关决议中没投反对票）；（2）经费分摊的比例大小根据联合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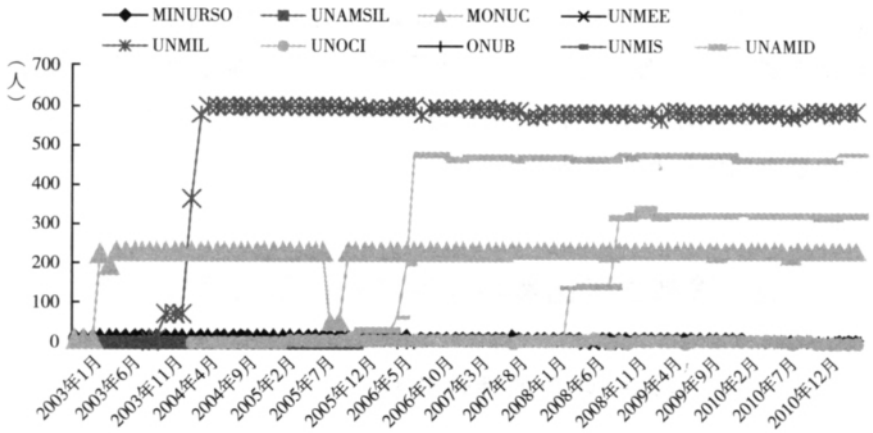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向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派遣人数（2003—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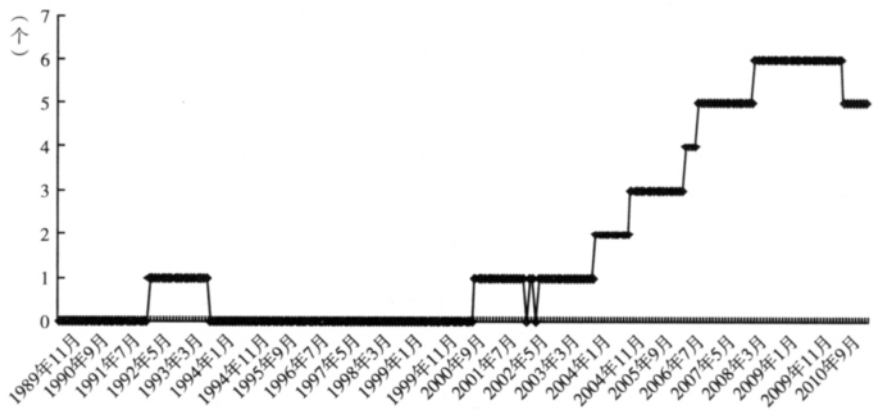

图 12　冷战后中国派出大规模维和使团的变化（1989—2010）

注：大规模维和使团是指参加人数达 50 人以上（含 50 人）的维和使团。

国相关文件的数据，以 2003 年 7 月为界，分为“比例偏小”与“比例增加”两种情况；（3）派遣规模进行如下操作：首先根据中国是否派出分为“不派遣”和“派遣”两类，后者再以 50 人为界分为 50 人以下的小规模派遣与 50 人以上（含 50 人）的大规模派遣；（4）派遣期限进行如下操作：以中国实际派遣人员参加维和行动的开始与结束时间为统计对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象，以2年为标准，分为2年以内（含24个月）的短期派遣与2年以上的长期派遣；（5）伤亡情况以中国实际派遣人员参加非洲维和行动是否有人员牺牲为统计对象，分为“有人员牺牲”与“无人员牺牲”。以上数据均由联合国维持和平网站提供。

五、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理性分析

（一）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全面考察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战略目标与手段进行细分，根据其重要性确定权重。其中，将作为收益因素的预期目标划分为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领域，又具体细分为六类：政治支持、捍卫主权、地区影响、商业利益、能源资源与军事实践经验。作为成本因素的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实施手段从以下五方面考察：投票表决、经费分摊、派遣规模、派遣期限与伤亡情况。

关于收益与成本各项因素的权重划分说明如下。在收益因素方面，对于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领域的权重划分基于以下考虑：根据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阐述，政治领域的合作是中非关系的重中之重，是中非合作的前提与基础；经济领域的合作则是中非关系发展迅速的关键，应该予以足够重视；军事方面的合作也应加以考虑，但重要性显然不如前面两个领域。在成本因素方面，考虑到投票表决、经费分摊、派遣规模、派遣期限与伤亡情况分别代表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各个重要方面，因此按相同比例加以划分。

收益因素在“0”、“+1”、“-1”三个值之间选取，“0”表示该因素在对应的维和行动之中没有显著体现，“+1”表示正收益因素在对应的维和行动之中得到体现，“-1”表示负收益因素在对应的维和行动之中得到体现。成本因素则在“A”、“B”、“C”三项中选取。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6　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因素与成本因素

收益因素		成本因素	
政治因素(0.5)	1. 政治支持(0.2)	投票表决(0.2)	A. 弃权(0.2)
	2. 捍卫主权(0.2)		B. 赞成(0)
	3. 地区影响(0.1)	经费分摊(0.2)	A. 比例增加(0.15)
经济因素(0.4)	4. 商业利益(0.2)		B. 比例偏小(0.05)
	5. 能源资源(0.2)	派遣规模(0.2)	A. 不派遣(0)
军事因素(0.1)	6. 军事实践经验(0.1)		B. 小规模派遣(0.05)
			C. 大规模派遣(0.15)
		派遣期限(0.2)	A. 长期派遣(0.15)
			B. 短期派遣(0.05)
		伤亡情况(0.2)	A. 有人员牺牲(0.2)
			B. 无人员牺牲(0)

通过对冷战后中国参与的 24 项非洲维和行动的考察，按照对上述因素的操作化与赋值，笔者将检验情况通过表 7 反映出来（假设收益与成本因素存在不大于 5% 的误差范围）。

（二）理性分析的结论：理性主导

从冷战后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目标与手段出发，本文通过对收益因素与成本因素进行赋值，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行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对冷战后中国参与的 24 项非洲维和行动的统计分析（见表 7），笔者将表 7 中各项赋值数据进行整理，如图 13 所示。图 13 的横坐标为收益因素，根据表 6 中收益因素的赋值乘以对应权重后各项相加得出；纵坐标为成本因素，同样地根据表 6 中成本因素的赋值乘以对应权重后各项相加得出。笔者将中国参与的各项非洲维和行动通过平面坐标图的点表示出来，各点的横坐标为该项维和行动的收益值，相应地，各点的纵坐标为该项行动的成本值，各项维和行动通过数值化与平面化处理后得出取值结果（见图 13）。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7　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理性分析

行动名称 \ 影响因素取值结果	收益因素						收益合计	成本因素					成本合计
	政治支持	捍卫主权	地区影响	能源资源	商业利益	军事实践经验		投票表决	经费分摊	派遣规模	派遣期限	伤亡情况	
1. 联合国第一次安哥拉核查团（UNAVEM I）	-1	0	0	+1	+1	0	+0.20	B	B	A			0.05
2. 联合国过渡支援团（UNTAG）	-1	0	0	0	0	+1	-0.10	B	B	B	B	A	0.35
3.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MINURSO）	0	0	+1	0	0	+1	+0.20	B	B	B	A	B	0.25
4. 联合国第二次安哥拉核查团（UNAVEM II）	-1	0	0	+1	+1	0	+0.20	B	B	A			0.05
5. 联合国第一次索马里行动（UNOSOM I）	0	0	0	0	0	0	0	B	B	A			0.05
6. 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ONUMOZ）	0	0	0	0	0	+1	+0.10	B	B	B	B	B	0.15
7. 联合国乌干达—卢旺达观察团（UNOMUR）	0	0	+1	0	0	0	+0.10	B	B	A			0.05
8. 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UNOMIL）	0	+1	+1	0	0	0	+0.30	B	B	B	A	B	0.25
9.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	0	+1	+1	0	0	0	+0.30	A	B	A			0.25
10. 联合国奥苏地带观察团（UNASOG）	0	+1	0	0	0	0	+0.20	B	B	A			0.05
11. 联合国第三次安哥拉核查团（UNAVEM III）	-1	0	0	+1	+1	0	+0.20	B	B	A			0.05
12. 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MONUA）	-1	0	0	+1	+1	0	+0.20	B	A	A			0.15
13.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MINURCA）	0	+1	0	0	0	0	+0.20	B	A	A			0.15
14. 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UNOMSIL）	0	-1	+1	0	0	0	-0.10	B	A	B	B	B	0.25
15.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	0	-1	+1	0	0	+1	0	B	A	B	A	B	0.30
16. 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C）	-1	0	+1	+1	+1	+1	+0.40	B	A	C	A	A	0.65
17.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特派团（UNMEE）	0	0	+1	0	+1	0	+0.30	B	A	B	A	B	0.35
18. 联合国科特迪瓦特派团（MINUCI）	0	0	+1	0	0	0	+0.20	B	A	A			0.15
19.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	0	+1	+1	0	0	+1	+0.40	B	A	C	A	A	0.65
20.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OCI）	0	0	+1	0	0	0	+0.10	B	A	B	A	B	0.35
21. 联合国布隆迪行动（ONUB）	0	0	+1	0	0	0	+0.10	B	A	B	A	B	0.35
22.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UNMIS）	0	+1	+1	+1	+1	+1	+0.80	A	A	C	A	A	0.85
23. 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	0	0	+1	+1	+1	+1	+0.60	B	A	C	A	B	0.65
24. 联合国中非和乍得特派团（MINURCAT）	0	+1	0	+1	0	0	+0.40	B	A	A			0.15

注：（1）收益与成本计算方法为：各项因素的赋值乘以对应权重，然后将各项因素的乘积相加，如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收益因素计算：1×0.2+1×0.1+1×0.2+1×0.2+1×0.1=0.80。（2）在成本因素计算时，对于没有派遣的行动案例，只计算投票表决、经费分摊与派遣规模三项；对于实际派遣的行动案例，则计算投票表决、经费分摊、派遣规模、派遣期限、伤亡情况五项。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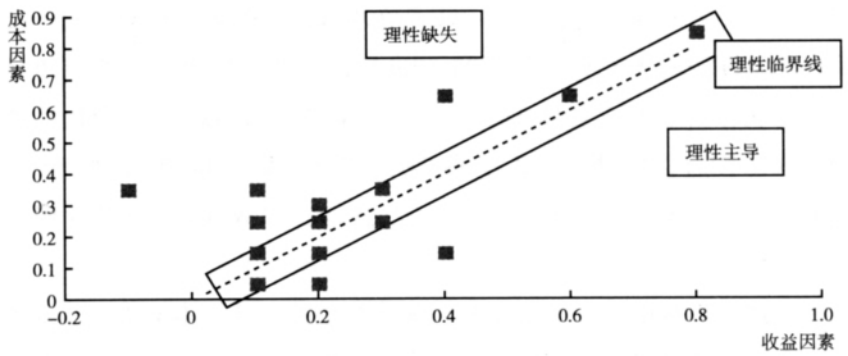

图 13　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理性分析结果

为了方便检验，笔者在图 13 中添加了作为辅助的“理性临界线”，在这条线上的点收益因素与成本因素相等，恰好满足理性逻辑的最低条件；“理性临界线”上方为“理性缺失”区域，即这部分区域分布的点收益因素小于成本因素，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临界线”下方为“理性主导”区域，即这部分区域分布的点收益因素大于成本因素，充分符合理性逻辑。考虑到收益与成本因素存在不大于 5% 的误差范围，以“理性临界线”为中心又画出约 5% 的误差可行范围（图中以实线框表示），在误差可行范围内的点均视为在理性临界线范围内。

理性分析结果如下：冷战后中国参与的 24 项非洲维和行动，其中 17 项（约 71%）符合理性逻辑，即收益因素大于或等于成本因素；其余 7 项（约 29%）不符合理性逻辑，即收益因素小于成本因素。由此，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大部分满足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然而，在其余部分非洲维和行动中，中国付出成本比预期收益要大，不符合理性逻辑。

从收益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1）对于收益不大的维和行动，中国通常采取“赞成—不派遣”的参与方式，如联合国在安哥拉的行动；（2）对于收益较大的维和行动，中国通常采取大规模派遣的参与方式，如联合国在刚果、苏丹、利比里亚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后中国参与的非洲维和行动中，有 7 项并不满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足理性条件。从时间上看，其中一项是在冷战结束初期的联合国过渡支援团（UNTAG）；其余6项均在1998年以后，包括中国派遣大规模维和部队参与的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C）、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以及小规模参与的联合国塞拉利昂维和行动（UNOMSIL/UNAMSIL）、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OCI）与联合国布隆迪行动（ONUB）。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借用概率与统计的相关工具，本文进一步对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收益—成本分析。表7已经分析统计出冷战后中国参与各项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与成本，通过计算收益与成本比例，本文得出“收益成本指数”（I），根据收益成本指数的取值情况考察理性所起的作用：如果该指数大于1，则收益大于成本，符合理性逻辑；如果该指数小于1，则收益小于成本，不符合理性逻辑。本文将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成本指数视为随机变量①，而且收益成本指数可能取的值可以按一定次序一一列出，因此可视为离散型随机变量②。表8为收益成本指数（I）的概率分布（也称之为I的分布列）。

表8　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收益成本指数（I）的分布列

I	4.00	2.67	2.00	1.33	1.20	0.94	0.92	0.86	0.80	0.67	0.62	0.40	0.29	0.00	-0.29
P	0.17	0.04	0.04	0.13	0.08	0.04	0.04	0.04	0.04	0.08	0.08	0.04	0.08	0.04	0.04

注：P为概率，I、P数据依据表7统计得出。

本文运用概率统计学中的“数学期望”（又称平均数、均值）来分析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成本指数的平均值。在概率统计学中，通常用“数学期望”反映离散型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水平，数学期望是每次可能结果的概率乘以其结果的总和。通过计算，冷战后中国参与

① “随机变量”是指变量的值无法预先确定，仅以一定的可能性（概率）取值的量，是由于随机而获得的非确定值。

② “离散型随机变量”即在一定区间内变量取值为有限个，或数值可以一一列举出来，例如某地区某年人口的出生数、死亡数，某药治疗某病病人的有效数、无效数等。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非洲维和行动收益成本指数（I）的数学期望为 1.63，也就是说收益成本指数的平均水平为 1.63。由此可知，总体而言，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即理性起主导作用。

进一步来讲，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出发点是将收益最大化，同时将成本最小化。在收益方面，对于收益较大的非洲维和行动，如在苏丹、刚果、利比里亚等国的行动，中国均十分重视，派出大规模维和部队参与；此外，中国在加强与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的合作方面，也获得了大的收益。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联合国在讨论非洲问题时需要尊重非洲统一组织（2002 年更名为非洲联盟）以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的意见；在非洲问题的相关决议案中，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充分考虑非盟意见的决议案中国往往通过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① 在成本方面，对于收益较小的非洲维和行动，中国往往采取“投赞成票，但不参加实际行动”的方式，使成本尽可能缩小；在 2003 年以前的实际派遣人员中，以军事观察员为主，伤亡情况鲜见。在 2003 年之后中国对收益较大的维和行动派出了大规模的维和使团，成本相应增加。

（三）部分理性缺失及启示

正如上文所说，在冷战后中国参与的部分非洲维和行动中，中国付出的成本比预期收益要大，不符合理性逻辑。在联合国过渡支援团（纳米比亚）案例中，中国首次派遣军事观察员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更多的是考虑到当时国内外背景，仅就该维和行动而言，中国预期收益十分有限。对于其他不符合理性逻辑的案例，笔者对理性逻辑解释力不足提出一些补充说明。

第一，就物质收益而言，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并不能带来丰厚的收益。如果将参与维和行动带来的物质收益分为战略层面的政治支持与经济

① 其中一例为联合国安理会第 5933 次会议，讨论对津巴布韦制裁问题，参见联合国文件 S/2008/447，S/PV. 5933。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层面的能源资源、商业利益的话，那么实际上大部分非洲维和行动与上述关系不甚密切。从战略层面的大国关系改善来讲，非洲维和行动中涉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情况虽然存在，如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与法国关系密切，但并不多见。而且，中国对大国主导（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多国临时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这一点在联合国第二次索马里行动中可以看到，虽然这并不属于本文定义的维和行动的范畴。从中国获取政治支持的角度来讲，非洲维和行动对象国并没有因中国参与该国维和行动而对中国在安理会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冷战后中国在安理会投弃权票或否决票时，非洲国家大部分并没有保持与中国一致的做法，这表明中国通过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而从非洲国家获取的政治支持十分有限。从经济层面来讲，虽然中国与非洲的经贸与投资关系日益密切，但从经贸绝对总量而言，非洲只有南非与尼日利亚比较重要，而这两个国家并不需要部署维和行动；在能源资源方面，中国是有所获益的，体现在维和行动与能源国家的交集圈，如苏丹、安哥拉等。然而，非洲国家的能源与自然资源进出口总量占中国进出口总额比例甚小，虽然有大幅上升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的进出口可能占据非洲国家相当重要的位置（中国已是非洲多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第二，就观念收益而言，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其实也并不大。首先是捍卫主权，中国十分强调维和行动需要尊重当事国的意见，必须取得冲突各方的配合，这一点在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以及联合国苏丹特派团（UNMIS）中都有所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都是在停火协议签署后经各方同意后部署的，仅有一小部分是未获得当事国或冲突各方的充分同意。虽然中国比较坚定地捍卫主权，但在个别维和案例之中也有例外的情况，如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UNOMSIL）在没有实质同意与停火的情况下即进行调查与监督，而中国实际上是同意并派出维和使团。因此，在捍卫主权方面中国实际获益并不大。其次是国家形象的改善，这与中国政府极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密切相关。必须指出的是，国家形象的改善有时候与捍卫主权是相冲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突的，这一点已有不少学者提出来，即中国在坚持不干涉原则与参与国际事务之间需要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①] 国家形象还涉及中国派遣的维和人员在非洲当地执行任务时给当地人民留下怎样形象的问题，毋庸置疑，在中国大规模派遣的维和使团，如在苏丹、利比里亚等，中国人员都留下了比较好的形象。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为数不多，所以在国家形象上的实际获益也并不大。

第三，作为实施手段的成本因素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由于冷战后非洲冲突的复杂性，因此非洲维和行动任务授权有所扩大，非传统维和行动（扩大的维和）比较普遍。其结果是，对于参与冷战后非洲维和行动的要求大大增加，无论是派遣规模还是人员配置方面，而且由于冲突长期性，维和行动一般持续较长时间，行动任务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参与维和行动的成本。因此，在中国参与的维和行动之中，出现成本大于预期收益的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

本文沿着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转变。经过基于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本文发现理性能够解释冷战后中国参与的大部分非洲维和行动，然而并不是全部，有一部分并不符合收益与成本的理性逻辑。那么，如果理性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量，是否还存在其他力量呢？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理性缺失的重要启示是，从规范与理性互补的思维出发探寻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动机。理性与规范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关系。按照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Olson）的分类，行为体的行为动力主要遵循两种逻辑：后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sm）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②] “后果性逻辑”是指行为受预期后果和原有偏好的逻辑驱动，基于利益、

① 王猛 《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6 期，第 35—40 页。

② 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 《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载〔美〕卡赞斯坦等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66—371 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成本、机会、权力等方面的权衡考虑，通过仔细评估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从而选择一种为实现自身偏好而提供了最有效手段的方案。“适当性逻辑”是国家行为受适当性和认同意识的逻辑驱动，行为遵循与特定情景之特定认同相联系的规则，认同或者内化了群体所共有的意义和理解，认为遵守规则是“适当的”，因而调整并遵守来自体系层面的规范。马奇与奥尔森所说的两种行为逻辑——“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理性与规范的两种动机。正如马奇与奥尔森所说的，这两种逻辑并非相互排斥，后果性逻辑或适当性逻辑一般不能单独解释政治行为，任何特定行为都有可能包含两种逻辑的因素。[①] 从规范角度探寻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这应该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六、结语

通过对冷战后中国参与的24项非洲维和行动的“成本—收益”理性检验后发现，理性逻辑能够有力地解释大部分中国参与的非洲维和行动，即不符合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标准。这表明，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与其说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国际责任体现，不如说是中国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经过成本—收益战略计算的重要步骤。同时，本文的结论表明，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攫取能源资源与保护商业利益并不足以构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充分条件；中国预期通过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换取非洲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的政治支持，坚决维护主权原则，并提升中国在非洲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都成为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结果还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并不能用理性逻辑有力地解释和说明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或者在相当一部分案例中，中国支付的成本要大于获得的收益，即存在部分理性缺失的情况。

① 马奇、奥尔森 《国际政治秩序的制度动力》，第37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表现，然而这方面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希望更多学者能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通过联合国提供的维和行动各项数据，我们也许能够比较直接地了解一些事实，但具有理论性的分析与统计仍然十分缺乏，比如运用定量方法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进行分析。维持和平行动往往与和平建设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在这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方面的研究仍旧相当薄弱。因此，这也许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 者 简 介

邓子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10 级硕士研究生。2010 年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dengzili2008@ sina. com

王翠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2002 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史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cuiwen@ nankai. edu. cn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 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uj@ cass. org. cn

杨　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10 级博士生。2010 年 7 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yyir@ 163. com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专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 – 2000* 等。

电子信箱: johnston@ fas. harvard. edu

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教授。专著有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Resistance in Pacific Asia*;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等。

电子信箱: callahan@ manchester. ac. uk

卡宁汉 – 克洛斯（Linsay Cunningham-Cross）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linsaydc@ aol. com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